

一般论文  
Research Articles

# 美援文化下的马来亚华文出版界 ——以五、六零年代 友联出版社为例

Malaya's Chinese Publishing under the United States Aid Culture:  
A Case Study of Union Press in 1950s to 1960s

赖美香  
(LAI Mooi Heong)

## 摘要

国共内战导致部分不认同中国共产党政权的文人与知识分子纷纷从中国大陆南渡香港落脚。当中一些文人又从香港再往同为英殖民地的新加坡与马来亚发展。1954年, 拥有美援背景 of 香港友联机构在新加坡设立分部, 一年后搬迁至吉隆坡。友联出版社在马来亚成立后, 中国南来文人背景的友联同人先后抵马协助友联开拓出版业务, 相继创办《学生周报》和《蕉风》杂志。本文将透过布赫迪厄 (Pierre Bourdieu) 的场域 (field)、资本 (capital) 和惯习 (habitus) 这一组概念处理从中国大陆流落香港再南迁至马来亚的这些友联自由主义文人如何从香港迁移并落脚于亚洲大陆最南端的马来亚。在这过程中, 友联同人如何利用其关系网络涉入政治场域以在文学领域取得方便, 并进一步探讨友联出版社和美援文化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 冷战、美援文化、友联出版社

## Abstract

During the Chinese Civil War, some writers and intellectuals did not agree with the regime of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had left the Mainland China to British Hong Kong. Some of them were then continued migrated to the British colonies of Singapore and Malaya. In 1954, the US-funded Hong Kong Union Press set up their branch in Singapore, and then moved to Kuala Lumpur a year later.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Union Press in Malaya, a number of the writers turned up in Malaya to expand the publishing market. They then established the literary magazines, namely *The Chinese Student Weekly* and *Chao Foon*. By using Pierre Bourdieu's concept of field, capital and habitus, this article tried to explain how the writers of liberal stance left the mainland to British Hong Kong, and finally remained in Malaya. How these Union colleagues make use of the publishing network in political arena and gain success in the field of literature, and further more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nion Press and U.S. Aid Culture.

**Keywords:** Cold War, U.S. Aid Culture, Union Press

## 一、前言

历史上发生的移民潮简单地由两大因素造成：政治与经济。战争常会引发大量人口的迁移，世界各地犹然。自抗日战争（1938年），到皖南事变（1941年），而至国共内战（1946年）爆发以后，中国人大规模往南移。这与之前的大规模人口迁移的不同之处是，始自抗日战争时期，在大量向南移动的人潮中有不少知识分子。这些文人作家或为避开战乱到海外鬻文为生，或到海外进行文艺宣传活动，他们的目的地主要为香港，其中一些文人则以香港为中转站再南移至南洋<sup>1</sup>。周恩来早在1937年末，便开始派员在港开展统战工作，建立文化宣传阵地，有计划性地把大陆沦陷区的文化人移送到香港。另一方面，为加强南洋华侨的统战工作，同时欲突破香港的新闻封锁，派遣胡愈之、梁上苑、黄薇、杜埃、林林等十多人到南洋各地进入左翼报刊工作或办报抗日（袁小伦1999：205-207）。

皖南事变后，香港的抗战文化运动更为活跃。从中国大陆出走的文人也持续不断，在1940年前后南来的左翼文化人尚有杨骚（皖南事变后到新

加坡）、王任叔（巴人，约1941年到新加坡）、金丁（原名金丁，1940年抵达新加坡）、卢心远（约1939年南来）、吴柳斯、沈兹九等。根据中国中央档案馆的电子报原件资料，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周恩来在部署“抢救文化人”活动中不只一次提到马来亚是其中一个香港文人的退路（引自袁小伦1999：215）。这也符合庄华兴（2014）提出的新马与香港是继武汉、重庆、桂林以后的“大后方”。

至国共内战爆发后，涌入香港的人潮更是大量增加。香港其时实为国共双方向南洋展开意识形态宣传及获取资金的前沿阵地，也是文人从中国大陆下南洋的中转站。香港与新马皆为英属殖民地，两地文人南来北返可说相当自由<sup>2</sup>。这些南来新马的知识分子或文化人除了在报馆任职，还办报出版刊物<sup>3</sup>，或在各地的华校任教职<sup>4</sup>，通过文化传播争取南洋华侨的支持，部分文人则因避难南来。1949年前后，随着中国共产党在大陆频传捷报，许多旅居香港与新马的左翼文人开始北归，迎接“新时代”的到来。正值此时，马来亚英殖民政府强硬对付马来亚共产党，不少左翼报刊遭查封，许多左翼分子被递解出境<sup>5</sup>，而一些右翼或第三势力文人则离开大陆南来香港，再转至新马，如李星可、钟文苓、徐訏、刘以鬯、杨际光等。1954年始，另一批友联机构的文人如申青、黄崖、黄思聘、方天、姚拓、白垚等也先后南来新加坡开办具美援背景的香港友联出版社新马分部。因国际冷战势力的争夺，亚洲中文文学版图悄悄发生变化。马华文坛在这个时候的真空恰好被南来第三势力文人填补。战前即占据文坛主流的马华左翼文学也因而面对竞争，中国大陆的政权易帜导致香港乃至马华文学生态的更迭或转变。

1950年代是美苏冷战的巅峰时期，意识形态对立日趋白热化，双方从欧洲至亚洲展开没有战争硝烟的文化冷战。美国将1940年代末在欧洲展开的文化冷战战略<sup>6</sup>运用在亚洲，以香港作为桥头堡，对中苏展开意识形态反击。1949年之后，美国认为中共通过各种手段争取东南亚华人在政治与经济上的支持，对周边的亚洲国家展开“渗透”活动。韩战爆发后，中共抗美援朝，美国把中共视为在亚洲的主要敌人，而东南亚华人成了美国与中国在冷战意识形态斗争中欲争取的对象<sup>7</sup>。为了防堵共产主义在亚洲扩

散，美国开始改变对东南亚华人的政策，根据翟韬（2013）的研究认为美国对东南亚华人有以下五个政策目标：

- 一、在海外华人中进行反共活动；
- 二、促进海外华人融入东南亚当地社会；
- 三、促进台湾与东南亚各国改善关系；
- 四、促进海外华人理解美国并支持其政策；
- 五、在海外华人中促进对于台湾的支持，但不要与“融合”的目标矛盾。

以上除第三个政策目标外，都需通过宣传手段来达至。美国设在香港的美国新闻处（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Service, USIS—Hong Kong）成了美国宣传心理战的最重要机构。香港美新处把东南亚华人视为宣传的主要对象，其主要工作是提供中文资讯与灌输美式价值观，如出版中文书籍、西书中译、制作中文广播节目等。美国在马来亚采取的方法是提供书籍、出版物、电影等予学校和其他华人组织，因美国认为共产主义的势力极有可能在马来亚扩张（张杨2013）。美国新闻处经常赠送大量各语文（包括英文、华文、马来文、淡米尔文和印度尼西亚文）出版物予新加坡、马来亚和婆罗洲的950所学校<sup>8</sup>（*The Straits Times* 27 June 1951: 8）。此举显然是用以对抗左翼文化文学在这些地区的传播，同时美国也借此加强宣扬美国文化与精神的优越以削弱或抵消中共对东南亚华人的影响。

在冷战时代，美国还通过美援文化政策或由华盛顿幕后支持的“亚洲基金会<sup>9</sup>”在亚洲发行图书。在香港，亚洲基金会资助多个出版社，如友联、人人、亚洲出版社。此外，亦资助成立属亚洲出版社旗下机构的亚洲影业公司<sup>10</sup>。香港美新处及多个美援支助的出版社的出版品皆倾销至东南亚各国，图通过文化影响东南亚华人精神与价值观。文化冷战的战斗场域除了在香港之外，更延伸到东南亚。在冷战意识形态对立白热化的1950年代，新马文坛也成为左右两派的战场。1954年，随着香港友联在新加坡设立分部，友联的美援背景导致它成了新马左翼人士指摘的对象，左右两派泾渭分明，水火不容。下文将探讨友联出版社和美援文化之间的关系。友联从香港南移至新加坡，两年后再迁往吉隆坡。在那个特殊的时代氛围

下，友联向南扩展的不仅仅是业务，也是一种文化势力。马来亚友联同人如何利用其关系网络涉入政治场域，以便在文学文化领域取得方便，这是下文尝试讨论的问题。

## 二、南移的文学场域——友联出版社

友联出版社由一批从大陆流落香港，既不认同中共政权也不愿追随台湾国民党政府的第三势力知识分子组织起来的出版社，背后接受亚洲基金会的资助。友联出版社的宗旨是追求“政治民主、经济公平、社会自由”（卢玮銮、熊志琴2014：11），其首要目的是透过在香港与东南亚等地出版各种有针对性的刊物，以文化工作影响华人社会共同对抗共产党，最终促使中共政权结束，这就突出了友联的政治身份。在《友联出版社》的介绍小册子中，清楚说明其工作目标：

就短期来说，我们希望与其他团体及个人合作，影响华侨社会、教导自由世界（尤其东南亚）的中国青年，使他们认清共产主义和共党统治的真相，与东南亚其他人民全心合作，以对抗共党的颠覆活动。我们所有的中文出版物，殊途同归地都是以东南亚华侨为主要对象——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以及儿童。……就较长期来说，我们希望促进两千万自由中国人的文化运动、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使他们成为一个强大的、团结的民主力量，以影响大陆局势，促使中共政权结束。

（也斯1988：104）

从1952至1955年间，香港友联机构先后创立针对不同年龄层读者的刊物，《中国学生周报》（1952年7月25日）、《祖国周刊》（1953年1月5日）、《儿童乐园》（1953年1月15日）及《大学生活》（1955年4月10日）。这些刊物特别是《中国学生周报》在东南亚有很高的销售量<sup>11</sup>，并深具影响力。1954年5月，《中国学生周报》特别创办了一个印尼分版，加重地方情调，销路大增。一年后，又出版了新马版和缅甸版（余德宽1954）。

《中国学生周报》在香港的成功经验让友联机构决定在东南亚设分

部。1954年,《中国学生周报》的社长余德宽(申青)先到新加坡打前锋,和他同来的还有方天(张海威)。他们与在新加坡的作家李宏贲、陈振亚、范经、马摩西等人于1955年11月创立了《蕉风月刊》。1956年决定把香港的新马版,南移到新加坡重新登记,把原有的《中国》两字取消,定名为《学生周报》。1958年8月,友联印刷厂在马来亚八打灵市成立,于是便将《学生周报》与《蕉风》迁至吉隆坡。

### 三、友联的资金来源

本时期的马华文坛正是左翼文艺自1948年紧急状态的严厉打压后的低潮期,文坛呈现真空状态,这批友联的南来文人迅速填补其位置,在香港以外的南洋建立了第二个非左翼文学场域。他们夹带各种文化资本形式而来,致使他们可以在短时期内在马华文学场域占据一定的位置。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在其“文学场域”理论中指出掌握资本数量越多者,便能在文学场域中占据更优势的位置。布赫迪厄将受马克思影响的“资本”概念发展为四种资本形式,即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sup>12</sup>。一个人或社会群体拥有的资本类型和数量将决定他或他们在社会空间的位置,进而决定其权力。

香港友联机构拥有美援背景,接受亚洲基金会的资助已为人知<sup>13</sup>,在卢玮銮、熊志琴编著《香港文化众声道1》(2014)一书中,几位曾在1950至70年代活跃于友联的文化人,包括溪会璋、何振亚、古梅、孙述宇、林悦恒、胡菊人皆承认友联的确曾接受亚洲基金会的资助。其中友联第一代核心人物之一溪会璋承认亚洲协会(即后来的亚洲基金会,Asia Foundation)是友联最主要的经济来源,友联若光靠卖书并无法维持业务。亚洲基金会在香港、台湾、马来亚等地都有分部,1956-1959年溪会璋在新马期间,经常由他与亚洲基金会接触。除了逐年的拨款,在马来亚买地所费都是亚洲基金会给的(卢玮銮、熊志琴2014: 66-70)。友联接受具美援背景的亚洲基金会资助后,本身已累积了一定的“政治资本”与“文化资本”。至于其支使金钱的方法,友联中人皆异口同声指出友联

虽接受亚洲基金会的资助，但都没有为金钱出卖自己，也无需听命行事<sup>14</sup>。亚洲基金会主要是根据友联逐年交上的工作项目计划书和预算批放款项，此计划书内容有否顺应美国的要求而写则不得而知。资本在场域内是斗争的武器，也是争夺的关键，使资本拥有者能够在场域内对他人施加权力，运用影响（皮耶·布赫迪厄2008：160）。马来亚友联从一开始即掌握了经济资本，这使到它能在马来亚文学场域中很快占据优势的位置，这也使友联无需顾虑刊物的销路问题，编辑们可以免除后顾之忧进行内容革新与改版，与左翼刊物竞争，争夺青年读者。此外还举办各类活动如生活营，与读者互动。

友联所拥有的经济资本性质导致友联同人被左翼分子讥为美国的走狗。左翼文人抨击他们是拿了美金替美国写文章的文化流氓、乞丐，是美国的奴才<sup>15</sup>。当时在马来亚左翼思潮高涨的社会背景下，接受亚洲基金会资本援助的马来亚友联被怀疑有政治目的，其情况比香港友联更为严重（卢玮銮、熊志琴2014：97）。此外，一些友联人物的反共立场十分鲜明，如燕归来<sup>16</sup>在马来亚短期逗留期间便经常进入农村及有华人的偏僻地方作宣扬民主讲座，吸引华人认同民主主义，是名副其实的政治反共。他们在不知不觉中间接成为美国观点的传播者，直接或间接为美国做政治宣传，让亚洲基金会的支出得到回报。这也正符合了美国的美援文化政策目标，隐身幕后通过提供资金资助特定项目，攫取人心，以达到政策目标。

#### 四、友联的活动策略

南来的友联中人大部分受过高等教育，这让友联进一步掌握了文化资本，这也是与美国欲通过知识分子影响学生的计划是一致的。1954年，当时美国副总统尼克森（Richard Milhous Nixon）到东南亚考察后意识到本区域国家的知识青年虽少，却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张杨2013：64）。这些知识分子及其思想与立场成为冷战双方的争夺对象。当时东南亚的学生面临升学问题，尤其是高等教育机会更为局限。根据美国大使馆调查显示，1951年1月至12月，约有15,400人次的东南亚学生前往新中国接受

教育（转引自王梅香2014）。美国担忧这些青年的意识形态受共产主义渗透，回国后加以传播。尼克森回国后便发出指示，要求相关单位协助东南亚华人青年到台湾接受“民主、自由、反共”教育，学成回国后可传播“自由思想及民主生活”，以遏制东南亚共产势力的渗透（赵绮娜2001：110）。美国忧虑华人青年学子受共产思想渗透亦成为友联关注的问题。在白垚（2016b：88-89）的自传体小说《缕云前书》中，顾薇（古梅）于即将离开《学生周报》赴美深造时，认为白垚是接手通讯部的理想人选，因为他除了文章写得好以及能与作者谈文说艺外，还希望以他台大毕业生的身份，影响马来亚的学生去台湾升学，减低他们对大陆的向往和憧憬。此外，也希望他让学生们了解中西文化的大问题，以抵御共产思想的传播。由此可知，大致上可见友联在选择社员时之考虑。南来友联诸子几乎都受过大学教育，这足以让他们有效发挥知识分子的影响力。以下是曾参与新马友联工作的该社同人<sup>17</sup>，其学历背景可见一斑：

姓名	出身	学历	经历
徐东滨 （许崇智、岳心、王廷芝） <sup>18</sup>	湖北省恩施县	北京大学	曾任友联出版社秘书长、总编辑、社长、友联研究所所长、《明报》、《星洲日报》主笔等职。1995年逝于美国。
余德宽（申青）		北京辅仁大学	南渡香港后曾任《中声报》编辑，后任《中国学生周报》创刊时期督印人（1952年7月25日第1期至1954年12月3日第124期）。1954年到新加坡发展友联工作，创办《学生周报》及《蕉风》。
陈濯生（陈思明、薛洛）	原籍河北	中央大学	友联出版社董事长。1955年来马，后移居美国。所写新诗曾收录在马来西亚华文课本中。



溪会璋	原籍安徽	香港新亚书院经济系	1949年抵港。在新亚书院求学期间得钱穆推荐参加友联的活动及参与工作。1953年毕业后转为全职工作，翌年担任《中国学生周报》督印人。1956至1959年间到新马发展友联，任新马《学生周报》社长。1960年赴美深造，1963年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后返港。自美回港后，正式代表友联和亚洲基金会联络。历任友联出版社社长、友联研究所秘书长。1967年移居美国。
俞南琛		北京清华大学经济系	友联出版社副董事长。原先在台湾大学教书，经不起陈思明的再三邀请才南来。马联公司的组成都是由他设计。1980年左右全家移民美国。
黎永振			友联社早期成员，1956年接替陈日青任《中国学生周报》督印人（1956年8月17日第213期至1957年6月21日第257期）。与姚拓先后来到马来亚，当《学生周报》社长，后来做了友联社的董事经理。
王健武	上海出生，原籍安徽。	香港新亚书院经济系	1949年抵港。1952年入读新亚书院经济系，在学期间已担任《中国学生周报》通讯部主任。1954年毕业后加入友联开始全职工作。1950、1960年代，主要参与友联在新马的发展工作，曾筹办剧团及担任发行公司、印刷厂等负责人。约于1967年回港，其后历任友联研究所秘书长、友联文化事业公司董事长、友联出版社社长，1970年代初转而经营玩具生意并移居美国，在三藩市定居。
张海威（方天）		上海交通大学	中国共产党创办人之一张国焘之子。中英文都有根基。1955年，和余德宽从香港南来新加坡参与创办《蕉风》月刊。在新加坡出版短篇小说《烂泥河的呜咽》。70年代，移居加拿大。

姚天平（姚拓、姚匡）	出生于河南省巩义市鲁庄	曾在巩义市师范学校读书，毕业于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十七期步科。	军旅出身，曾任上校。1950年到香港。曾住在调景岭难民营，当荃湾硫酸工厂工人时认识《儿童乐园》创办人阎起白，由此加入友联。1953年任职《中国学生周报》校对，同年8月，任该报总编辑。1957年由香港移居新加坡，任《学生周报》主编，《蕉风》月刊编辑。1958年随《学生周报》与《蕉风》编辑部移居吉隆坡。1963年担任马来西亚友联出版社总编辑，后来逐渐参与教科书的工作。2009年于马来西亚逝世。
刘国坚（白垚、刘戈、苗苗）	出生于广东省东莞县道滘乡	台湾大学历史系	1949年抵香港。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回港担任《大学生活》编辑。1957年11月南下新加坡，未几迁往马来亚吉隆坡。先是负责组织《学生周报》的学友会、生活营，后来王健武离马后，他到友联印刷厂担任厂长职务，兼编《学生周报》与《蕉风》。1981年移居美国。其诗作〈麻河静立〉被认为是马华文坛最早出现的现代诗。著有《缕云起于绿草》。2015年6月逝世于美国。
黄崖（叶逢生、林音、陆星、庄重）		毕业于中国的大学，校名不详。	1950年到香港，曾参与《大学生活》及《中国学生周报》编辑工作。1959年转赴马来西亚任《蕉风》及《学生周报》编辑，及后主持新绿出版社及《星报》，并协助《新潮》、《荒原》、《海天》等刊物出版。1992年于泰国曼谷逝世。
黄思聘		复旦大学	1950年到香港。曾参与自由出版社工作，并经常在报刊发表小说、散文。1952年主编《人人文学》。1960年曾南来吉隆坡任《蕉风》编辑。1961年到麻坡中化中学执教，1962年回香港后于树仁学院任教。1984年逝世。

邱然 (Maria Yen、燕归来、燕云)	江西省宁都县石上镇莲塘村人	北京大学	友联社创办人之一。曾任友联出版社秘书长、友联研究所所长等职，主要负责与亚洲基金会接洽。中英文都很好。1950年代一度移居新马。《学生周报》学友会的《生活营歌》歌词就是由她撰写。1967年离开友联后，曾短暂于香港中文大学任职，后赴德国深造，获哲学博士学位后，在瑞士苏黎世大学任教。
古梅	南京出生	新亚书院哲学系	1949年抵港。1951年入读新亚书院哲学系，经溪会璋介绍加入《中国学生周报》兼职，1955年毕业后转为全职。在友联先后参与编辑《中国学生周报》、联络通讯员等工作，1955年至1956年间曾代任社长，并到新马参与友联工作。1957年底离开友联赴美升学，毕业后留在当地从事教育工作，在美国俄亥俄州定居。
胡欣平 (司马长风、秋贞理)	东北	国立西北大学	抗战胜利后曾任国大代表。1949年初离开北平，辗转到香港，曾为民主中国青年大同盟成员。及后与友人合办友联社，曾参与多种刊物的出版工作。1968年冬南来马来西亚，他是友联出版社最后一位南来文人。1969年7月，他辞职返港。1980年病逝于美国纽约。

根据上表，从出身来看，他们全都是1949年国共分裂后南来香港。从学历分布来看，除姚拓毕业于军官学校外，余者均有大学学历，他们掌握的文化资本，让他们在香港文学场域中占一定的位置，由此累积了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相当于知识能力资格总体，由学校系统生产或由家庭承传下来。文化资本又分为三种形式，一是内化形式如举止风范（如对公众演讲时的泰然自若）；二是客观形式像文化财货（如名画收藏）；三是制度化形式，指的是经由合法制度所认可的学历（朋尼维兹2002：73）。第一种形式指的是长期稳定地在人体内在化的生活经验，形成人的才能或天性，构成惯习（habitus）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燕归来为例，她出身于书香

世家，父亲为北京大学名教授邱椿，中英文俱佳，散文与诗也写得好，面对群众演说更是毫无惧色。再以方天为例，父亲是中国近代史赫赫有名的人物张国焘。张国焘曾在法国留学，是中国共产党元老之一。方天中英文俱佳。方天多才多艺，不但文章写得好，也擅演话剧。此外，上表中各人几乎都毕业自著名大学，所拥有的“学历”即布赫迪厄所说的“制度化形式”的文化资本，他认为“学校资本主要是来自正规教育以及可以被评定的学历”（Pierre Bourdieu 1993: 7）。易言之，即接受正规科班教育得来的资本。从上表所示，可知南来友联诸子都拥有来自良好家庭传承或正规教育背景，不难使他们在当时马华文学场域占优势位置。

当他们这些自由主义文人将他们的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带到马来亚来时，很轻易地便能获得当地的文人支持，让他们更容易在一个新的场域中占有一席之地。1954年余德宽与方天来到新加坡后，他们迅速地便得到比他们更早落脚于此的文人作家如李宏贲<sup>19</sup>、陈振亚<sup>20</sup>、范经<sup>21</sup>、马摩西<sup>22</sup>等人的支持，在1955年11月创立了《蕉风月刊》。李宏贲、陈振亚、范经、马摩西都是亲国民党反共文人。其中陈振亚先后曾担任新加坡《中兴日报》、檳城《光华日报》、吉隆坡《虎报》主笔及编辑。此三家报馆立场皆亲国民党，社论明显反共。马摩西则是国民党于二战后派到新加坡领事馆的使节。有相近惯习的人一般都拥有相近的背景（特别是经济条件），这样的背景会让他们的外在行为与价值观越接近，在社会空间中也处于同一位置和阶级。从教育背景、自原乡离散的原因以及在香港友联服务过的经历来看，友联诸子都具有一些共同点。所以也有类似的惯习，相近的惯习让他们在文学场域中有较接近的位置。这样的背景让他们可以更容易发挥团队的精神，抱着相同的理念，他们的惯习是呈现反共、自由主义两种思潮并置的状态，这些思潮同时成为这些文人惯习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延续香港友联的创办宗旨，一起在新的文学场域占据新的位置，累积文化资本，继而发挥影响力。

文化资本的累积让他们更容易亲近或接触学生。友联的目标就是学生，在文化与意识形态上影响东南亚华校生。根据白垚的《缕云前书》（2016a: 37），在《学生周报》成立初期，在新加坡和马来亚便设有九

个通讯部（后来改称学友会），通讯员全是在校学生，也多是优秀的文艺作者，通讯部在学生课余举办文化活动，培养自由文化精神。白垚（同上：37）在文中也指出这其实是文化播种工作，是在意识形态上，与共产主义唯物思想争持与抗衡的文化工作。友联出版的《学生周报》以中学生为主要对象，正需要大学毕业生负责这项工作，在友联的邀请下，白垚到了马来亚负责通讯部的工作，与各地通讯员、代理、作者和读者联络交流，举办生活营、野餐会，分享文化和写作经验。在白垚（2007：85）眼中，不少读者作者在通讯部的活动中，实践了独立思考、自由抉择、正心诚意的人文精神。姚拓（2005：561-567）便认为《学生周报》最大的用处，是《学生周报》的学友会组织。从姚拓的回忆录中，也可印证《学生周报》的主要目的是要在中学生群中进行文化播种与意识形态的改造工作。姚拓从香港转到南洋发展的主要原因是因他不会说广东话，而香港中学生都以广东话为媒介语，所以他无法与香港中学生直接沟通，只能纸上谈兵。反之，新加坡和马来亚的学生大多接受华文教育，这让姚拓更易于与新马的学生沟通。马来亚友联除了主办与香港相似的活动，如合唱团、戏剧、文艺创作等之外还办野餐会、生活营等，借以向华侨青年宣扬民主思想与保存中华文化。

在美国亚洲基金会马来亚的代表与基金会主席于1955年6月29日的通信中，亦可看到友联创办马来亚版《学生周报》的目标便是组织、加强并扩大反共的学生群。从上所述的活动中确切可印证此点，《学报》所举办的各种学生活动其实就是要让学生远离共产主义。之后创办《蕉风》的终极目标也一样：就是遏制共产主义在学生群中继续渗透及加强自由世界力量的学生组织活动。

学生周报社和马来亚版《学生周报》公开联合友联出版社，将继续帮助组织、加强并扩大明显反共或相当强烈地倾向于反共的学生群……另一方面，蕉风社与其出版物《蕉风》——本地组织并完全脱离友联出版社，不过获得友联出版社和学生周报社领袖密切关注——将帮助、加强并扩大中层无组织学生，其终极目标是把这群学生推离共产党阵线……由此，蕉风社为其出版物订

立了以下条规：1.此杂志不应在开始的阶段过度凸显反共意识或讨论任何政治课题。2.此杂志不应批判或显示出对当地政府的怨恨。3.此杂志应提倡民主精神和人身自由原则。4.此杂志应主要包含由本地学生、老师和作者提供的文学和教育资料，以及应经常呈现同类内容的马来文翻译中文的资料。5.此杂志也应包含新加坡/马来亚以外的良好此类资料。6.此杂志应悄悄的以及小心地参与将为新加坡/马来亚的发展给予正面贡献以及加强自由世界力量的学生组织活动。

(The Chinese Student Weekly Society and the Malayan edition of the Chinese Student Weekly, openly associated with the Union Press, will continue to help organize, strengthen, and expand that student grouping which is either clearly anti-Communist or fairly strongly inclined toward an anti-Communist posi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Chiao Feng society and its publication, Chiao Feng, locally organized and completely disassociated publicly from the Union Press but under the close supervision of Union Press and Chinese Student Weekly leaders, will help organize, strengthen, and expand the middle block of unorganized students, with the ultimate objective of swinging this block away from the Communist front.)

(Asia Foundation Archives, Hoover, Box P-135, File: MEDIA Publications Chiao Feng [Union Press Student Garden Fortnightly], Malaya/Singapore 103, Program.)

从信中内容可看出，亚洲基金会资助友联创办《学生周报》与《蕉风》都是有其政治目的的，并非如他们所说的纯粹是创办一本“纯文学”期刊。条规中所谓的远离政治，正是要让人更无戒心地堕入政治的改造活动中。

1958年，燕归来从欧洲回到马来亚，在《学生周报》办的生活营中讲了两个专题，其中一个“什么是民主？”，她说民主不限于政治，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燕归来所宣扬的民主、自由、反共其实就是美国欲灌输予东南亚华裔青年的美国价值观。若将《学生周报》所进行的活动内涵置入文化冷战的历史脉络来观察，这一点倒是与美国当时文化冷战中的行动目标是一致的，他们正是要通过潜移默化影响学生的生活态度，

认同所谓的民主自由价值观，要学生与知识分子加入“自由阵营”，以达到打击共产主义目的。所以当时的学友会被认为通过举办这些活动中学生进行思想工作，那些学友会的成员、阅读或售卖《学生周报》的学生都被视为是美帝国的支持者（王琛发2010：387）。

除了举办各种活动，《学生周报》特设读者信箱，就读者提出的各类问题予以解答。在与读者的互动过程中，友联出版社的编辑和读者关系越见密切，建立互相信任的关系，累积更大的“象征资本<sup>23</sup>”，在年轻的读者群中形成强大的号召力，吸引更多的读者加入其队伍。累积他们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就形成了具声誉和威信的象征资本。

## 五、友联的政治关系网络

友联挟着在马华文学场域内的活动而累积的象征资本，很快便在文学场域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在当时马华文坛左派势力高涨的背景下，他们之所以能如此迅速占据一定的位置，也得益于他们与政治场域之间的关系。亚洲基金会的资金来源便已显示友联本身是一种政治资本，加上其第三势力的背景，也就决定了它与政治的不可分割。根据溪会暉与王健武的口述，友联与马来亚的联盟<sup>24</sup> 政府逐渐建立起良好的关系，联盟马华公会的梁宇皋<sup>25</sup> 对友联的一些年轻朋友很欣赏，对友联的鼓励及帮助甚多。梁宇皋是马华公会的发起人之一<sup>26</sup>，马华公会成立于1949年，正是马共走入森林打游击，英政府宣布紧急法令之后。马华公会的成立是受到英政府的鼓励，希望马华以反共的立场与马共互相争取华人的支持，协助英政府早日解决马共问题。马华公会与友联拥有同样的反共立场，因此造就了双方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友联诸子与梁宇皋的关系。1955年《学生周报》怡保办事处开幕时还邀请时任卫生福利部长的梁宇皋剪彩。友联与马来亚联盟政府之间的关系是“互惠互利”的，他们以中国大陆学生运动的运作方式帮助联盟竞选，最后让他们认识的梁宇皋成功当选议员。王健武指出友联办的生活营从某方面来说也帮了政府不少，他认为友联办的生活营是很重要的学生活动，他们将学校里的通讯员都集中起来一起生活三个星期，灌

输学生各方面的知识（卢玮銮、熊志琴2014：153-154）。他虽没指明他们帮了政府什么，但可想而知，在当时世界冷战格局下，政府集中火力要歼灭共产党的时刻，他们帮助政府灌输予学生的是何种知识。这也跟美国文化冷战的目标是一致的，美国在亚洲冷战中的意识形态斗争焦点正是青年人。195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认为中共最危险的是对东南亚学校系统的渗透，扩大共产主义对东南亚华人学校的控制，因此美国希望能促使海外华裔学生转向支持“自由民主”而远离“共产主义”。友联同人拿了亚洲基金会的资金后，不知不觉中其实是在替美国传播反共讯息，为所获基金提供合理性。白垚（2007：65）在谈到燕归来时，便曾提到燕归来在1958年8月于马六甲举办的《学生周报》第四届生活营中讲的其中一个专题是“什么是民主？”，她说民主不限于政治，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这其实就是冷战时期左右对立时的一种政治话语，提倡这样一种生活方式与态度，相对来说肯定是排斥另一种生活方式与态度的。燕归来还经常去农村及有华人的偏僻地方作不同演说，有时候由梁宇皋陪她去。白垚（2007：57）指出：“有一次，《蕉风》社长申青谈到他和薛乐、燕云（燕归来）在马来亚独立途中，燕归来三辩新村群众大会的经历。……燕归来的知性和理性，让无数的街头标语显得浅薄，让无数狂呼的口号哑然失声。她让村夫知理，让村妇知权，让彷徨的知判断，让踌躇的知抉择，让他们用自己的手，投下自主的一票，掀开这片土地的新章。”从中不难看出往右翼联盟政府靠拢的友联同人的政治目的和使命——灌输西方民主观念与生活方式，塑造反共力量。

1959年左右，梁宇皋面临极大的财务困难，友联的财力无法助其解困，溪会暉还特地搭火车去新加坡找向来把他当小弟弟看待的陆运涛<sup>27</sup>借钱（卢玮銮、熊志琴2014：61）。从友联同仁可以为梁宇皋向陆运涛借钱，以解其财困可知彼此之间的关系并非泛泛之交。友联同仁与联盟政府建立的良好关系有否让其在文学领域中取得方便呢？根据溪会暉与王健武的口述（卢玮銮、熊志琴2014：69-70），友联靠着与政府一些要员的关系，要求政府批准友联同人长期居留马来亚，这让友联因此在马来亚稳定了下来。从这种种关系，我们可以窥探出友联与当时马来亚政府的关系



并非一般。与梁宇皋的交往这种人际上的缔结，与政府中人这样的关系网络，友联肯定从中得到许多方便。他们之中留在马来西亚的人都得到了居留权，让他们无后顾之忧地继续发展友联事业。1959年，友联成立的马来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获得马来亚政府的认可出版教科书，供应予马来亚中小学使用。当其时美国为了使东南亚华校摆脱共产主义影响，美国新闻处投入大量精力出版华文教材，以便在华校“排挤掉共产党的教材”（张杨2015）。友联在此时出版教科书是否与美国此政策有关，又或有否得到美国资助则有待更深入研究。但它可以获得联盟政府的青睐出版供学校使用的教科书，则肯定与其右翼背景以及与联盟政府关系密切有关。马来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曾在1958年进入马六甲州长府召开第一次编辑会议。当时的州长正是梁宇皋，他邀请马来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编辑委员会到州长府开会，主要是想对友联要出版教科书的工作表示支持与敬意。他同时强调他个人十分重视教科书的马来亚化（白垚2016b: 300），这与《蕉风》在1955年创刊时打的口号“纯马来亚化”是一致的，如果回头看冷战史研究者翟韬（2013）所认为美国对东南亚华人的五个政策目标的第二条：“促进海外华人融入东南亚当地社会”，这背后到底有否为冷战时代脉络下由美国主导的政策服务则不言而喻了。

## 六、小结

友联手掌握的经济资本（美国亚洲基金会的资助背景）以及政治资本（与联盟政府的良好关系）让他们在文学场域中获得更好的发展空间，但这一些资本既带来正面的影响，也带来反面的影响。在冷战意识形态强烈对立，非左即右的五、六零年代，他们成了左翼攻击的对象，被认为勾结美国势力，背后又有权贵（联盟政府要员）撑腰。具左翼史观的方修亦把友联视为现实主义的敌对阵营，在其书写的马华文学史刻意隐去友联。若不计其美援背景，友联在马华文坛的影响是深远的，《学生周报》与《蕉风》几乎是六字辈、七字辈文艺青年人手一本的文学读物，可说是许多马来西亚目前文人作家的启蒙读物。

姚拓认为《学生周报》的最大用处是其校友会组织（2005：566），每年假期校友会都组织生活营或野餐会，传播自由主义人文精神。白垚、黄崖、姚拓在马来半岛南上北下为学生们办活动，这些活动可说是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了学生的思想，散播了青年的文学种子，继而发芽生根，许多后来的马华作者都曾参加过友联主办的生活营与野餐会。

黄崖与白垚执编《学生周报》与《蕉风》时开始介绍与推广现代主义文学，常转载台湾与香港现代诗人的作品。他们之后才有接棒的李苍（李有成）、冷燕秋（麦留芳）、周唤等受台湾现代主义文学影响的本土少壮派以及直接受西方现代主义影响，以完颜藉（梁明广）和牧羚奴（陈瑞猷）为核心的力量。《学生周报》与《蕉风》可说是马华现代主义文学崛起的推手，引领往后二十余年的马华文学风潮。

## 注释

- 1 根据王赓武的说法，“南洋”即“南方的海洋”，所指的是经由海洋，即经由南中国海而到达的地区。中国人在不同时代经由陆路进入的越南、老挝、缅甸和暹罗就被排除在“南洋”的领域之外。所以“南洋”指的就是在大陆东南亚中位处要冲的沿海地区，包括马来亚和新加坡，以及菲律宾、印尼的大部分岛屿（王赓武1988：207）。
- 2 随友联出版社南来的姚拓便曾指出当年由于马新和香港同为英国殖民地，所以只要在香港申请一张出入准证，就可以随便在新加坡或马来亚登陆和居留（姚拓2005：562）。
- 3 自1950年代开始，美国开始关注数目相当庞大的东南亚华人群体。海外华人人数至少达1千300万，比当时台湾1千万的人口还要多（王梅香2015：60）。国共大分裂后，国共双方也极力争取华侨支持各自认为的正统政权。另一方面，内战后的建设工作更是迫切需要来自华侨庞大的经济支持力量。
- 4 除了发展蓬勃的报刊杂志为这些南来文人提供谋生机会，当时许多南来文人也在严缺师资的东南亚华文学校任职。这些在华校执教的文人后来被英殖民政府视为在华校传播共产思想，在1950年代中发生的学生运动中对其展开逮捕行动并递解出境。
- 5 1947年9月，在南洋仅逗留了半年的夏衍被英国殖民政府由新加坡遣返香港。10月，巴人也被驱逐，回到香港。
- 6 1950年，美国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以后者为主力）幕后策划在西柏林举行首届

- 大会的“文化自由联盟”（Congress of Cultural Freedom），是针对苏联和“原共产国际”的文化反击。这个以美国为主导、但在欧洲举行的活动，虽由欧洲人发起，经济来源则是中央情报局，并就此趁便创办了十多份刊物。最有名、影响最深远的，大概是英国的《文汇》（Encounter）和德国的《月刊》（Der Monat）；这两份刊物对战后英德文化生态影响深远。另外，联盟更出资出版社，还办电台（即“自由欧洲之声”）（郑树森、黄继持、卢玮銮2000：14-15）。关于“文化冷战”可参看弗朗西斯·斯托纳·桑德斯（2002）和Peter Coleman（1989）。
- 7 1945年12月，胡愈之创办新南洋出版社，出版综合周刊《风下》以及由沈兹九主编的《新妇女》月刊。1946年11月，陈嘉庚集资创办了《南侨日报》。该报由陈嘉庚任董事主席，胡愈之任社长，张楚琨任总经理，李铁民任督印（陈蒙志2013）。
- 8 “More Chinese schools in Malaya now want to be on the mailing list of 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Service in Singapore. A USIS spokesman said that 950 schools in Singapore, the Federation and Borneo are receiving the pamphlets, pictorials and posters distributed free by USIS regularly. The literature is in English, Chinese, Malay, Tamil and Indonesian.” “USIS Literate in Demand” (1951, June 27)
- 9 亚洲基金会原名“自由亚洲委员会”，成立于韩战的高峰期。在美国政府总体冷战战略的指导下，它从1951年起就在亚洲开展了广泛的文化和社会活动。“自由亚洲委员会”于1954年改组为“亚洲基金会”，并确定其发展宗旨为：其一，向亚洲正致力于赢得和平、独立、个人自由和社会进步的个人或团体提供来自美国的私人支持；其二，建立在相互尊重与理解的基础上，鼓励并加强有着相同目标和理想的亚洲、美国和国际组织间的合作；其三，与其他美国个人和组织合作，促进美国对亚洲人民、亚洲历史、文化和价值观的更好理解。亚洲基金会与美国中央情报局有密切的联系，1967年以前一直接受后者的资金资助，成为准非政府组织，进行政府无法直接参与，但又希望促成的活动（张杨2013）。
- 10 中央情报局成立亚洲基金会后，1951年友联出版社与人人出版社受资助成立；1952年9月则有亚洲出版社成立（由报人张国兴主持，后并创办亚洲影业公司）。同年香港美国新闻处更直接参与香港文化运动，创办综合性月刊《今日世界》，稍后成立今日世界出版社，宣扬、介绍美国文化及其价值观。人人出版社创办《人人文学》。友联出版社则针对不同读者群来创办刊物，其先后创办的刊物有《中国学生周报》、《祖国》、《儿童乐园》、《大学生活》。亚洲出版社通过《亚洲画报》在港、台、东南亚一带举办小说征文比赛（郑树森、黄继持、卢玮銮2000：14-15）。
- 11 根据姚拓在《雪泥鸿爪》中指出1954年以后《学报》的业务比以前扩大了数倍，加印印尼版、新马版和缅甸版，总印量在五万份以上，分版以印尼版的销量最多，其次是新马版。当时《学报》编辑部加上业务部，职员有二十多位，是《学报》最鼎盛的时期（2005：535）。

- 12 经济资本是由不同的生产要素（土地、工厂、工作）及经济财货总体（收入、遗产、物质财货）所构成。文化资本由学校系统生产或家庭承传下来，指知识能力总体。社会资本指个人或团体所拥有的社会关系的总和。拥有了以上三种资本或其中的两种或一种资本后所带来的信用及权威便是象征资本（Bonnwitz 2002）。
- 13 有关于此的论述可参阅赵稀方（2006）。
- 14 详见《文化众声道1》。
- 15 这一类的抨击多出现在左翼期刊里，例如1966年5月10日出版的《浪花》中便出现这样的批评：“……马来西亚文艺界标榜着‘为艺术而艺术’，底帮闲文人所盘踞着在金元和指挥刀底下高视阔步，对广大人民底痛苦，对社会底不幸抱着一种麻木不仁的态度漠然视之，却高谈什么现代诗之类的谬论，这种行为却又是卑鄙的。……一些暗地里拿了金元的文化流氓、乞丐之流所搞的什么‘纯文艺刊物’，这一派作者既拿了钞票在先，而写作文章于后，当然在字里行间流露了浓厚的奴才气息，没有光也没有热，除了一部分拿去蒙骗无知之学子，一部分被人拿去厕所抹大便之外，真正能够被人们所欣赏的也就不多了。”（李政1966：1）
- 16 燕归来，又名邱然、燕云、Maria Yen，是友联社创办人之一。曾任友联出版社秘书长、友联研究所所长等职，主责与亚洲基金会接洽，是第一个与亚洲协会建立业务关系的人。中英文都很好。1950年代一度移居新马。《学生周报》学友会的《生活营歌》歌词就是由她撰写。1967年离开友联后，曾短暂于香港中文大学任职，后赴德国深造，获哲学博士学位后，在瑞士苏黎世大学任教。著作有《红旗下的大学生活》。
- 17 本图表关于友联同人生平部分，多参考《香港文化众声道1》、《雪泥鸿爪》。
- 18 括号内为笔名。
- 19 李宏贵（1914-1991），笔名李汝琳，原籍河南北阳，193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47年南来新加坡。
- 20 陈振亚，笔名洛萍、白蒂、江陵等，祖籍福建南安。1936年东吴大学法学系毕业。1946年南来新加坡，先后曾担任新加坡《中兴日报》、檳城《光华日报》、吉隆坡《虎报》主笔及编辑。此三家报馆立场皆亲国民党，社论具反共意识。
- 21 范经，笔名常夫，出生于中国福建省。毕业于协和大学，1947年南来新加坡。
- 22 马摩西于二战结束后便奉命抵新任职。
- 23 在布尔迪厄看来，所谓象征资本是用以表示礼仪活动、声誉或威信资本的积累策略等象征性现象的重要概念。声誉或威信资本有助于加强信誉或可信度的影响力，这类资本是象征性的（高宣扬2005：823）。
- 24 联盟成立于1951年，是由巫统、马华公会及印度国大党组成的马来亚右翼各民族政党联盟。1952年，巫统和马华公会首次联合在吉隆坡市议会选举中竞选，并获得胜利。1954年印度国大党加入。联盟在马来亚独立运动及1963年马来西亚的成立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联盟也是目前马来西亚国民阵线（国阵）的前身。
- 25 梁宇皋（1888-1963），出生在马来亚霹雳州。孩提时曾在中国念书，十三岁时

回马来亚，先后在怡保、檳城英校求学。后来前往英国伦敦大学攻读法律，毕业后返马，在怡保操律师业。1932年回中国。二次大战期间在云南省富海县当县官，兼任富田省立银行富海县分行经理。大战后回马，继续律师业。为殖民地政府赏识，先后委任为马来亚宪制建议咨询委员、立法议员。1957年受委为马六甲州州长。1959年受委为上议员，并以上议员身份出任司法部长。1963年1月11日去世。在任部长期间，曾参与起草教育报告书。为报告书事曾与被誉称为马来西亚华族族魂的林连玉激烈冲突，被林连玉斥为“民族败类”（林连玉1988：72-73）。梁宇皋与汪精卫有亲戚关系，曾与梁宇皋定亲的表妹陈璧君乃汪精卫妻子，梁宇皋到中国任职是否与汪精卫引荐有关则无史料证明。巧合的是两人都分别在中国与马来西亚有“汉奸”的骂名。

- 26 1949年2月27日，陈祯祿与其他十五位立法议会的华人立法议员，包括余有锦、李孝式、邱德懿、杜荣和、李焕文、梁长龄、邱观发、温林鸣凤、廖光汉、陈修信、胡家濂、梁宇皋、林开成、李长景、杨旭龄、伍瑞琴联合发起集合于中华大会堂，全体一致通过成立马华公会。
- 27 陆运涛（1915-1964）是1940年代至1960年代新加坡和香港著名电影制片人，具右派背景的国泰机构、永华电影和国际电影懋业有限公司（电懋）创办人。其父陆佑是原籍广东鹤山的马来亚富商，曾资助孙中山的革命事业。陆运涛主持电懋期间，导演编剧演员人才济济，其中张爱玲、宋淇也曾为其撰写剧本。1964年6月，陆运涛在台湾一场疑因劫机造成的空难事故中丧生。

## 参考文献

- 白垚2007。《缕云起于绿草》。八打灵再也：大梦书房。
- \_\_\_\_ 2016a。《缕云前书》（上）。八打灵再也：有人出版社。
- \_\_\_\_ 2016b。《缕云前书》（下）。八打灵再也：有人出版社。
- 陈蒙志2013。〈胡愈之五年南洋情〉。《联合早报网》。<http://www.zaobao.com.sg/special/report/supplement/zb90/story20130906-249375>。6 September 2017。
- 翟韬2013。〈美国对东南亚华人宣传政策的演变（1949-1964）〉。《美国研究》2013年第1期。页117-137。
- 弗朗西斯·斯托纳·桑德斯（Saunders, S. Frances）2002。《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Who Paid the Piper? The CIA and the Cultural Cold War*）。曹大鹏（译）。北京：国际文化。
- 高宣扬2005。《当代社会理论》（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李敖1966。〈以业为业〉。《李敖研究》。<http://leeao.com.cn/forfashion/leeao/article/letters/shuxing-01.htm>。6 September 2017。
- 李政1966。〈一个理想，一个努力〉。《浪花》第7期。页1。

- 林连玉1988。《风雨十八年》（上集）。吉隆坡：林连玉基金。
- 卢玮銮、熊志琴2014。《香港文化众声道1》。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
- 朋尼维兹（Bonnewitz Patrice）2002。《布赫迪厄社会学的第一课》（*Premières leçons sur la sociologie de Pierre Bourdieu*）。孙智绮（译）。台北市：麦田出版。
- 皮耶·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华康德（Loïc Wacquant）2008。《布赫迪厄社会学面面观》（*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李猛、李康（译）。台北：麦田，城邦文化出版。
- 王赓武1988。《南洋贸易与南洋华人》（姚楠译）。香港：中华书局香港分局。
- 王梅香2014。〈美援文艺体制下的台、港、马华文学场域——以译书计划《小说报》（*Story Paper*）为例〉。“2014年战后马华、台湾、香港文学场域的形成与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马来西亚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主办，2014年7月18-19日）。
- \_\_\_\_\_2015。《隐蔽权力：美援文艺体制下的台港文学（1950-1962）》。台湾国立清华大学社会学研究所博士论文。
- 王琛发2010。〈马来亚冷战阴影下的风雨声、读书声与罢课声〉。见于郑文波、杨景水编《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学生运动史料汇编——纪念1957年“11.14”全国华校学潮五十周年》。吉隆坡：全马华文中学生捍卫华教运动五十周年工委。
- 姚拓2005。《雪泥鸿爪》。吉隆坡：红蜻蜓出版有限公司。
- 也斯1988。〈解读一个神话？——试谈《中国学生周报》〉。《博益月刊》第14期。页103-109。取自【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文学资料库】：<http://hklitpub.lib.cuhk.edu.hk/pdf/journal/1118/1988/445521.pdf>。6 September 2017。
- 袁小伦1999。〈周恩来与战时香港文坛〉。《周恩来百年纪念：全国周恩来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页204-219。
- 余德宽1954。〈崭新的阶段·遥远的行程〉。《中国学生周报》第157期。  
【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文学资料库】：<http://hklitpub.lib.cuhk.edu.hk/pdf/journal/78/1955/168153p.pdf>。6 September 2017。
- 张杨2013。〈冷战共识——论美国政府与基金会对亚洲的教育援助项目（1953-1961）〉。《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66卷第3期。页60-68。
- \_\_\_\_\_2015。〈冷战前期美国对东南亚华文高等教育的干预与影响——以南洋大学为个案的探讨〉。《美国研究》第3期。页114-132。
- 赵绮娜2001。〈美国政府在台湾的教育与文化交流活动（一九五一至一九七〇）〉。《欧美研究》第三十一卷第一期。页79-127。
- 赵稀方2006。〈五十年代的美元文化与香港小说〉。《二十一世纪》第12号。页87-96。
- 郑树森、黄继持、卢玮銮编2000。《香港新文学年表（一九五零——一九六九年）》。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
- 庄华兴2014。〈香港——马华文学共同体的形成〉。《当今大马》：<http://www.malaysiakini.com/columns/264527>。6 September 2017。

Asia Foundation Archives, Hoover, Box P-135, File: MEDIA Publications Chiao Feng [Union Press Student Garden Fortnightly], Malaya/Singapore 103, Program.

Coleman, Peter 1989. *The Liberal Conspiracy: The 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 and the Struggle for the Mind of Postwar Europ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Pierre Bourdieu 1993. *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Essays on Art and Litera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USIS Literatere in Demand (1951, June 27). *The Straits Times*. p.8.